

沙特国内变革全面推进

金良祥

[内容提要] 穆罕默德·萨勒曼 2015 年 4 月被任命为副王储,后逐渐成为沙特政权的核心人物,开始在权力继承体制、经济结构及宗教等方面进行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这场变革是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部分是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压力,根本上则是时代发展潮流对沙特王室重构统治基础的要求。这场变革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波及沙特国内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也包括中东地区政治安全形势乃至更远。由于其进步性,这场变革从长期看将有助于促进中东地区稳定,但在短期内可能加剧地区动荡。当然,即使变革的既定目标全部实现,沙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征程仍将艰巨而漫长。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沙特 政治转型 国内变革

[作者简介]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研究员、副主任,主要研究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

2015 年 4 月穆罕默德·萨勒曼被任命为副王储并逐渐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之后,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陆续出台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涉及王位继承、经济战略以及女性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内容。沙特这场变革是中东变局波澜壮阔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并将继续冲击沙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对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尝试系统考察沙特变革,并探讨其影响。

—

沙特国内变革是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国情、改革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就所涉及的领域而言,沙特变革具有全面性。第一,打破既定王位继承秩序。沙特原有王位继承秩序被打破是其变革的前奏。2015 年 4 月沙特国王颁布敕令,免去二代亲王穆克林的王储职位,任命其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为王储,任命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副王储;2017 年 6 月,萨勒

曼国王再度颁布敕令,免去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王储职务,任命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系列换储动作解决了下任王权的代际过渡、继承制度和继承人年轻化问题,而且可能将永久性终结兄终弟及的权力继承模式。以王位继承秩序的变动为肇始,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获授王位继承权,并被视作国王背后真正掌握实权的核心人物,从而开始主导内容广泛的政治改革,如取消安全、政治、经济和发展委员会,成立政治与安全事务委员会和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①以提升权力运行的效率。

第二,实行经济结构多元化战略。经济结构多元化战略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国民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增加非石油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②2016 年 4 月出台的《沙特阿拉伯 2030 年愿景》是沙

^①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s Al Arabiya Interview,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en/media/inside-the-newsroom/2016/04/25/Full-Transcript-of-Prince-Mohammed-bin-Salman-s-Al-Arabiya-interview.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3 月 10 日)

^② Simeon Kerr, "Saudi Reshuffle: Five Key Reforms in Riyadh", *The Financial Times*, May 10, 2016.

特变革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地位、投资能力以及地理位置视为愿景规划的三大支柱,表示沙特要努力将上述“核心优势转化为实现未来经济全面多元化发展的利器……把阿美石油公司从单纯的石油开采企业转型为国际工业生产企业集团,把公共投资基金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①该报告还提出,要在 2030 年之前实现非石油出口占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6% 提高至 50%,使非石油政府收入从 1630 沙特里亚尔增加到 1 万亿里亚尔。^②

第三,实施更为宽容的社会政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废除限制女性权利的一些政策,赋予女性更多经济和社会权利;二是实施更为宽容的宗教政策。《沙特阿拉伯 2030 年愿景》将“促进社会发展,焕发社会活力,以构建一个稳固而成效卓越的社会”作为构建活力社会的重要目标。^③其中承诺,要在 2030 年之前让女性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 30%。^④此外,沙特于 2017 年 9 月宣布将允许女性开车,10 月宣布允许女性在公共体育馆观看体育比赛。在宗教方面,2017 年 10 月,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上表示,沙特将重返“温和伊斯兰”,希望沙特的“宗教和传统更加宽容”,表示沙特“不会耗费 30 年的时间来处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要马上摧毁它”。^⑤只是目前尚未公布关于宗教温和化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

沙特的变革之所以能全面推进,主要是因为沙特的政治精英认识到,沙特面临的是全方位的问题,某一方面的滞后都有可能对其他改革的失败,因而需要各个方面的成功改革,以保证国内君主制的长治久安及其国家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上的地位。

就适应时代要求而言,沙特变革具有进步性。从中长期来看,沙特王权继承制的变化有利于实现权力平稳过渡,随着权力继承人的年轻化,沙特的政治体制将会更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有利于沙特政治决策反映时代潮流和新生社会力量的要求。最突出的是,“石油产业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破坏了许多产业的发展”,^⑥经济结构多元化可以使沙特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使其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相对下降所带来的挑战。女性社会权利扩大以及宗教温和化也符合世界潮流,更是国际社会对沙特的期待。

然而,就触及问题的深度而言,沙特变革具有局限性,国际社会不应抱持过高的期待。即使沙特政府信心满满,但上述雄心勃勃的变革目标如何落实仍是未定之天,前路并不平坦。政治上,沙特权力继承秩序的改革将权力过渡限定在王室内部,没有向王室外部分权,更没有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权。经济上,沙特依赖石油产业的单一经济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观,而且由于缺乏人力资源储备和现代产业体系,要想真正建立起多元经济结构是十分艰巨的任务。^⑦同时,王储萨勒曼关于宗教温和化问题的观点只是表达了一种开放的立场和态度,并无内含实际意义的具体政策取向。2018 年 3 月初,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访问英国前夕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沙特将加大力度打击仇恨言论和宗教警察。^⑧这也只是给宗教极端化再画一次底线。沙特是否将对瓦哈比教义重新解读,还是对教义选择性采用,是停止还是限制对海外宗教学校建设的捐赠,目前均不得而知。

更需要注意的是,就实施方式而言,沙特变革具有激进性。沙特变革虽未进入更深层次,但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既定目标,就必然触动现有利益格局,必将克服诸多困难、应对诸多挑战。政治上,兄终弟及的权力继承模式终结难免引发预期王位继承人的不满;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因为冲击石油产业的传统垄断地位而必然引起有关利益群体的不满;妇女地位

① *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7, <http://vision2030.gov.sa/en/>. (上网时间:2018 年 3 月 10 日)

② *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61, p.67.

③ *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28.

④ *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39.

⑤ “Saudi Crown Prince Pledges Elimination of ‘What is Left of Extremism’ in Near Future”, *Arab News*, October 25, 2017.

⑥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s Al Arabiya Interview,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en/media/inside-the-newsroom/2016/04/25/Full-Transcript-of-Prince-Mohammed-bin-Salman-s-Al-Arabiya-interview.html>. (上网时间:2018 年 3 月 10 日)

⑦ Gregory Brew, “Can Saudi Arabia Really Break its Dependence on Oil?” *Oilprice(Web)*, May 11, 2016.

⑧ “Saudi Arabia, Britain Must Promote Islam Together, Says Crown Prince”,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gulf/2018/03/06/Saudi-crown-prince-Britain-Saudi-must-promote-moderate-Islam-together.html>. (上网时间:2018 年 3 月 10 日)

提升以及宗教温和化举措遭到保守势力的攻讦。当前,国际石油市场没有根本复苏,国内财政收入捉襟见肘而又为介入叙利亚和也门危机而负担高额费用,沙特很难通过分享石油财富的方式缓解国内矛盾。沙特变革因众多棘手问题而面临巨大风险。

应该肯定的是,从2017年11月开始,沙特便加大了反腐力度,这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手段。11月4日沙特发布国王令,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并任命王储萨勒曼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立之后便以涉嫌腐败和洗钱等犯罪行为为由,拘捕了11位王子、4名现任部长以及数十名前部长,其中就有沙特首富、王室成员瓦立德王子。^①为进一步加强反腐,2018年3月11日,国王再度发布命令,成立专门的部门调查并起诉腐败案件。^②诚然,反腐无疑有利于沙特王室政权的政治纯洁性和长远稳定,但因牵涉统治集团内部的众多重要人物而对该政权的政治治理能力和眼前政治稳定都构成严峻挑战。

显然,沙特变革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又兼具不力与激进,这种矛盾状况反映了沙特当前政治发展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鉴于部分周边国家在中东剧变中陷入政治动荡的教训,沙特王室对于改革有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改革的力度过大,反而可能冲击君主制的基础,造成不稳定。基辛格曾指出,“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③这种困境严重制约着沙特变革的力度和进展。

—

沙特国内变革是王室统治集团对王国各种体制机制沉疴旧疾的一次大诊治,变革既有其内生性原因,也是地区变革氛围影响的结果,还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外部压力。

沙特变革顺应了世界新形势下加强君主制统治基础的内在要求。沙特的君主制在共和制盛行的当今时代存在了较长历史时期,这说明有一定的民众

基础。因为君主制建立在部落长老世袭制的基础上,延续了沙特部落社会的传统;沙特王族——沙特家族为王国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沙特王国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8世纪中叶开始,沙特家族与正在崛起的瓦哈比教派结成联盟,并以瓦哈比教义为精神动力,开启了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进程,两起两落后最终建设起沙特王国。沙特家族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及其对瓦哈比教派的尊奉成了君主制主要法理基础。^④沙特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成为沙特保持稳定的经济原因。2011年中东剧变之后,沙特能够快速渡过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凭借石油财富,及时采取了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措施。^⑤

时代不断变化,民众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任何政权为了自身的持续稳定都要顺应时势和民心,实施新政,沙特也不例外。沙特家族的独特贡献及其与瓦哈比教派的结盟仍将是沙特未来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但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卫星电视和社交网络的普及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削弱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进而弱化了王室建构认同的能力。作为沙特政治认同的各种来源如权力继承、宗教信仰、部族制等,在现代性的驱动下都在重新建构中。但在沙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作为统治基础的直接选举未必适合国情、民情,在当下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对于保守的政治体制实行渐进式改革既是不断上升的合理要求,也具有现实可行性。权力更替制的变化和继承人的年轻化虽没有改变君主制,但可能带来更加开明的政治。经济结构多元化、女性平等权利增加以及宗教温和化等都将为王室争取更多支持。沙特王室自上而下的变革实践反映了王国重构君主制认同基础的意图。

^① “Saudi Arabia Princes Detained, Ministers Dismissed”, *Al-Jazeera*, November 5, 2017.

^② “Saudi Arabia Sets up Departments to Investigate, Prosecute Corruption Cases”, *Arab News*, March 11, 2018.

^③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和曹爱菊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0页。

^④ 毕健康“沙特阿拉伯国家建构”,《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86~100页。

^⑤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45~46页。

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示范效应构成了沙特变革的地区背景。受席卷阿拉伯国家示威抗议运动的影响,沙特陆续爆发了各种规模不等、性质不同的民众运动。2011 年 1 月下旬,在沙特西南部城市萨米他(Samitah),一位 60 岁的男性效仿突尼斯青年布阿吉吉引火自焚,表达对政府的不满。^① 同年 3 月,利雅得等主要城市还一度发生了以谋求更多政治权利和实施君主立宪制为主要诉求的“愤怒日”运动,只是由于沙特政府事先掌握情况、及时应对,运动规模没有达到组织者的预期。^② 其间,沙特东部什叶派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发生了要求更多宗教自由和经济发展机遇的示威游行,引发政府与什叶派民众之间的多次对抗,沙特政府为此处决了知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尼米尔,并最终引发 2016 年 1 月初与伊朗之间的外交风波。^③ 上述街头运动并没有对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造成严重冲击,一部分原因是沙特君主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相对于共和制而言仍然比较坚实,而且沙特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运用经济手段缓和了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沙特没有实施直接干涉。^④ 然而,这些运动表明,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浪潮唤醒了沙特等君主制国家民众政治参与和权利意识,虽然暂未对沙特政治稳定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但如不受限制地发展必将殃及政治安全。后来沙特采取变革措施这一事实则说明,沙特国内和周边抗议示威令沙特王室统治精英颇受触动,使他们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布鲁斯·瑞德尔(Bruce Riedel)指出,沙特真正的安全威胁在国内,只有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才不会发生政权更迭。^⑤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压力是沙特变革的外部动因。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甚至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⑥ 受此影响,美国国内从未真正放弃迫使沙特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意图,只是由于保持沙特局势的稳定符合美国当前利益,美国即未推动沙特巨变。美国在“9·11”事件以后高举反恐大旗对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战略,2003 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试图将民主化战略向阿拉伯半岛纵

深推广,2011 年中东剧变期间转而采取比较审慎的立场,但仍重申美国将“站在历史一边”。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2016 年 11 月出台的一份报告则认为,中东国家需要基于包容、效率、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等原则的新的社会契约,以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⑦ 这些无异于给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念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紧箍咒。

美国对沙特的不满不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涉及与君主制有着密切关联的宗教和人权领域。瓦哈比教义是沙特王国立国之本,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构成沙特政治稳定的基石。然而,沙特无论如何解释也无法完全撇清其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崛起的关系。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及其许多骨干来自沙特,2001 年“9·11”事件中 19 名劫机者当中有 15 人来自沙特。根据美国知名安全咨询公司 Soufan 集团 2015 年的统计,沙特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为“伊斯兰国”效力的外籍战士三大主要来源地之一,其人数多达 2500 人,其他两个分别为突尼斯和约旦。^⑧ 在美国看来,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不只意味着政治体制的落后,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沙特曾经严格限制妇女自由权利的政策更是强烈不满。沙特女性在没有男性亲友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外出,不能驾驶汽车,不能在公共场合观看体育比赛。这些与美国所倡导的人权、民主、自由等理念格格不入。

① “Man Dies after Setting Fire on Himself in Saudi Arabia”, *BBC News*, January 23, 2011.

② Neela Banerjee, “Saudi Arabia ‘Day of Rage’ Fizzle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2, 2011.

③ “Saudi Arabia Executes 47 on Terrorism Charges”, *Aljazeera*, January 3, 2016.

④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5 期,第 40~48 页。

⑤ Bruce O Riedel, “Saudi Arabia: The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 in Kenneth M. Pollack and Daniel I. Byman ed., *The Arab Spr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pp.159-167.

⑥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代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 页。

⑦ Madeleine Albright and Stephen Hadley co-chairs, *Middle East Strategy Task Force Final Report*, November 2016, p. 54.

⑧ The Soufan Group, *Foreign Fighters: An Updated Assessment of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into Syria and Iraq*, December 2015, pp.7, 9; Toby Matthiese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Islamists and the State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Uprisings”, Project on U.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t Brookings, August 2015, p.6.

沙特在保证石油资源以合理的价格流向“自由世界”及石油美元需求,构成美国在沙特的基本利益。美国政府从美国利益出发并没有将沙特政权更迭作为首要目标,甚至没有在推动沙特变革方面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但是美国国会以及大批民众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放弃对沙特的支持,甚至实施必要的惩罚。2016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97对1和348对77票通过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向沙特政府索赔。^①

只是美国上述的诸多不满都没有拗过美国与沙特之间地缘政治上的相互需求以及美国对沙特的军购大单,以致美国国内对沙压力显得有限。难怪有美国学者称,“9·11”事件以后呼吁沙特进行政治甚至宗教改革成了美沙关系的核心议题。^②

三

沙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庞大的人口规模、广阔的领土以及伊斯兰教两大圣地守护者的地位,因而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政治力量,乃至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国家。沙特变革的深远影响不只是在在于该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还及于中东地区的安全和地缘政治格局,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难免有消极的一面。

沙特变革的进步性注定了它的积极影响,那就是从长远看,它有助于沙特本国的长治久安和地区的稳定。一是有助于沙特通过自身的稳定促进地区的稳定。沙特于2017年6月发动的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一度损害了海合会国家的团结,也削弱了沙特自身的领导力,但沙特仍将是海湾逊尼派国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同时,沙特的政治体制在海湾地区也具有代表性,沙特稳定与否是海湾君主制国家整体稳定与否的重要风向标。沙特的稳定具有示范效应,能够通过自身的稳定促进地区的稳定。中东剧变期间,沙特由于处置得当,且没有遭到西方直接干预而免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海湾地区的总体稳定。因为沙特的稳定增强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的信心,而且沙特在维护国内秩序的同时,运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帮助巴林维持了稳定。同样,未来海湾君主国还会面临各种挑战,但这些挑

战会不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特是否稳定。

沙特变革尽管具有一定的激进性,损害了一些宗教信众和商业阶层的利益,但更为该国保守、沉闷的政治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且因为顺应时代要求、扩大君主制的社会基础,赢得了中产阶级以及妇女的支持。

二是有助于中东地区去极端化实践。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构成了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尽管沙特试图撇清其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但沙特在中东乃至世界各地资助宗教学校建设,并以瓦哈比教义为基本教学内容,是造成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原因。^③如前文指出,不仅沙特本国是“伊斯兰国”等外籍战士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来自沙特所捐助宗教学校的学生也构成了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来源。基辛格指出,“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言严苛的瓦哈比信条的宗教学校……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④穆罕默德·萨勒曼所倡导的宗教温和化事实上间接承认了上述事实,也有助于削弱宗教极端主义扩散的势头。沙特在宗教温和化方面究竟会走多元仍然不得而知,但无论力度多大,都会或多或少促进中东地区去极端化的努力。

从短期看,沙特变革因为其激进性而会产生消极影响,那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恶化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面对伊朗利用伊拉克战后的区域力量对比变化而扩大势力范围的新形势,沙特作为海湾逊尼派国家的“盟主”不得不参与这场地缘政治博弈。但是,沙特积极介入地区热点、奉行激进反伊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国内政治需要。

^① Karoun Demirjian and Juliet Eilperin, “Congress Overrides Obama’s Veto of 9/11 Bil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8, 2016.

^② F. Gregory Gause III, “Saudi Arabia in the New Middle East”, *Council Special Repor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 63, December 2011, p.25.

^③ 包澄章“中东变局与萨拉菲主义的新发展”,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年卷)》,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337~366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和曹爱菊译《世界秩序》,第175页。

随着国内变革的深化,特别是王室统治集团内的分歧、矛盾相应上升,沙特政府需要通过夸大外部威胁保持内部团结,此间奉行激进外交可适度缓解国内压力。

近年来,穆罕默德·萨勒曼采取了一系列激进动作,如2016年1月与伊朗断交,2017年6月主导多国对卡塔尔实施政治、经济和外交封锁,2017年11月要求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等,这些均与沙特试图通过强硬外交举措确保国内团结的考量或多或少有关。上述政策也都不同程度地助推了地区形势的紧张。沙特在也门和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更是两大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等外部力量长期支持叙的反政府力量;在叙政府军收复大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仍然支持反政府力量关于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这一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艰难曲折。

沙特在外交上的调整从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变革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其从之前低调保守的外交转向更加进取的外交。它更是沙特深化变革、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的需要。可以预料,沙特为了确保国内改革的顺利推进,还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对抗伊朗,宣扬伊朗威胁,从而不时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

实际上,沙特变革给地区形势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只在于此,还在于它使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复杂化。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和埃及等地区传统大国地位的下降,中东地区逐渐形成以沙特与伊朗为主要对手进行角逐的地缘政治新格局。然而,沙特为了国内政治需要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加剧了以它自身为主要方与以伊朗为主要方之间的对抗,甚至引发沙特阵营的某种内讧。一是沙特的激进外交导致原本沙特阵营内的成员卡塔尔出现疏离沙特的倾向。2017年6月沙特携手埃及、阿联酋、巴林等同时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上述重大外交行动有助于沙特缓和国内政治局势,但促使卡塔尔进一步与伊朗接近。二是沙特为了实施国内改革而多方迎合美国,这引发以色列的角色发生微妙变化。以色列本来被中东伊斯兰国家视为共同的敌人和威胁,但沙特与以色列之间最近则常常暗通款

曲。美国宣布要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遭到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对,而以伊斯兰世界“盟主”自居的沙特却保持低调立场,内中原因是沙特将伊朗而非以色列视为首要威胁,也是试图以之为筹码换取美国对其国内改革的支持。

结 语

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社会信息化的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清明日益成为影响世界众多国家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因素。阿拉伯国家的国体、政体建设没有完全跟上时代潮流,故而不时陷入政治动荡,一些政权甚至由于内部反对或外力干预而崩溃。沙特在中东剧变期间同样出现了民众抗议运动,幸运的是没有成为西方等外部干涉的主要目标,故而没有陷入燎原危机之中。沙特国王萨勒曼父子2015年起抓住剧变退潮的时机,自上而下实行进步的全面变革,做出明智的政治抉择。但是,王室是否有意志将改革进行到底则是这场变革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如何构建既符合自身以宗教立国的传统要求,又能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体制,将是沙特王储萨勒曼为代表的统治精英需要回答的问题。沙特如果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比较彻底的变革,那就有可能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为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起既符合自身国情又合乎时代潮流的通行模式,有可能为这个老牌资源输出国探索出更加成功的发展道路,进而地区强国并为区域乃至全球发展和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亨廷顿曾经指出,“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①他认为,沙特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是具备条件的核心国家之一。亨廷顿的观点表达出世界上众多人的期望,这一期望能否实现则需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黄昭宇)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